

## · 学术动态 ·

## 近现代德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

——湖北大学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陈家琪

1988年4月1日至5日,湖北大学召开了一次以人的主体性原则为主题的国际哲学学术研讨会,共有110多位国内外专家和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其中国外专家提供13篇)。9位来自联邦德国、法国、瑞士、美国、日本、民主德国的外国学者与10位国内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会议开得紧凑、热烈,充满着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的学术气氛。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为今后中外学者进一步的学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哲学的身份危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近现代德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问题。但会议一开始,现任德国哲学学会主席、汉堡大学哲学教授赫伯特·施勒德尔巴赫(*Herbert Schnedelbach*)就在报告中提出了哲学的“身份危机”问题。这一危机首先在康德那里表现出来:康德曾把“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问题)、“我应当做什么”(道德问题)、“我可以期望什么”(宗教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人类学问题)。但人类学或康德所谓的实用人类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呢?施勒德尔巴赫教授指出:“人是什么”的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终确定了所有哲学问题方向的根本问题,但它本身却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人类学只是一种“自经验原则得来的理性认识”;而“经验原则”在康德那里无论如何也不是“哲学的”,因为哲学(就“哲学”这个词的根本含义而言)指的就是“纯粹哲学”。于是,康德自己以其人类学清算了启蒙哲学以来的人类学思潮。他想通过他的实用人类学来最后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结果适得其反,使“人的问题”就此退出了哲学的中心位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施勒德尔巴赫教授认为人越成为科学的主题,人也就越加速着自身的消失。无论是生物遗传学、各种有关人的行为科学,还是把历史定义为人的本质,都只推动着一个趋势,即“人成了科学所考察的现象中的伴生现象,成了进化中的一种变异,地球生物系统中的一个特例,历史的一个塑造物,社会总体或各种社会关系的结节点”。“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有关人的各种科学肖象。施勒德尔巴赫教授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当代哲学中人的非中心化已走得有多么远!”

哲学的身份危机看起来是在科学的逼迫下尖锐起来的,实际上却反映出—个理性主体是否以其自身为最终目的的价值论问题。

波恩大学的施密特(*Gerhart Schmidt*)教授在这一点上与施勒德尔巴赫教授是一致的,即认为“超验之削弱的趋向,本身就包含着未曾被看清和不可能看清的对人的束缚”。人性失去了它的超验性,这就叫“异化”。异化根源于技术对人的统治。技术一方面排除了人对来自自然的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又是人与魔鬼的一种协定,“这协定包含着:人出卖它的灵魂,在这里,它的灵魂就是超验的能力”。

与施勒德尔巴赫和施密特比较起来,湖北大学的陈家琪更倾向于从本体论上把人是什么与可能是什么,把人的内容(文化历史的产物)与人的形式(超文化历史的先验根据)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于是,在“人是什么”这一问句中,“什么”永远成为“人”的规定(否定)。在表达出对一切有限内容的厌倦情绪后,他徘徊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想为人

(也就是自己)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在。

德国哲学中素有的思辨传统往往导致对某个虚假主体(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推崇。但到底什么才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呢?法国哲学会主席、普瓦提埃大学哲学教授雅各·董特(Jacques D'Hondt)对此发表了极为精彩的见解。他说,无论是抽出人的任何一方面的本质特征(比如劳动、自由意志、理性甚至于人的头发等等)给人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还是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境况和种种条件(比如男人女人父母子女、统治者被统治者等等)中加以考察,这样的人都是抽象的人。他说:“当然我们很可以说是主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什么一般的人创造历史。但这样我们就是以一个人取代了另一个抽象的人。”问题不在任何有关人的观念都是抽象的,而在“那实在的、活生生的、活动着的人就是抽象的。”董特教授在这里指的是现实的人就是有限的、片面的人,谁也不可能“早晨是钓鱼人,下午是文学批评家,晚上是物理学家”。具体的人就是完整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以可能性的名义提出一种设想。

问题集中在人们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上。因为正是在反思中,人才把自己与自己日常生活、工作着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返回到意识自身中来。瑞士卢采恩神学院的教授卡恩·格罗伊(Karen Gloy)女士对这种自我意识的传统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只有费希特才提出了一个修正或相反的有关自我意识内在结构的设想,这就是用于取代静态的反思结构的动态生产结构。这集中表现在费希特的著名命题“自我设定自身”上。

围绕人的自我意识问题,日本广岛大学隈元忠敬教授谈到了否定在黑格尔哲学中与精神的自我运动及自我认识的关系;北京大学的齐家骥教授分析了感性在康德认识学说中的地位;武汉大学的陈修斋教授和杨祖陶教授分别论述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对德国近现代主体概念的理论贡献以及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主体性的主观概念与作为客观整体的实体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中国老一代学者精细的理论分析,外国学者们表示了很大的惊讶和钦佩。这一切都正如张世英教授在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交往,我们才可能更多地在中外学者之间找到超出语言之外的共同性基础。”图宾根大学的哈特曼(Klaus Hartman)教授在他的题为《交往哲学与约定问题》中也说,也许正是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才构成人们生活世界及人的“在家”的存在。

## 人的处境

人的处境到底怎样呢?人能不能在一种无威胁的交谈中既不经约定又不借助于任何民主程序而返回到自己的那种“在家”的存在呢?大会的另一个中心议题围绕着人的必死性、享乐原则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主体中心论的有限性展开了讨论。

来自美国芝加哥罗旭拉大学的约翰·萨利士(John Sallis)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必死性与想象——海德格尔与人的专名》。必死成为人的专名,或者说,此在就是必死。这是一种专属于人的死亡。只有死亡对人来说才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它把此在所可能承担的一切可能性都变为不可能:“死亡是贴在此在可能性上的封条”。人的这种向死亡的存在使死亡成为某种先行于死本身的存在;但这又是一种不能成为“是”即不能具有任何现实性的纯粹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又是最异己的,因为人几乎无法想象自己的死亡,“死亡是一张没有想象、没有筹划刻在其上的封条。”死亡最本己也最异己;死亡不是虚无但又虚无。萨利士教授说,“这种通过分开而合至一起的能力,这种在人们称之为绝对的对立之间的徘徊,就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中被称为想象的东西”。想象是一种在作为最本己的死亡与作为最异己的死亡之间徘徊的能力;它不是通过分解与综合,而是通过将二者分开,再在相反意义上将二者融合的方式使人的存在与非存在进入一个靠想象的游戏而拉开的不可测度的空间。这就使传统哲学拘泥于主客对立的立场有了一个对人来说的本己性与异己性的新的融合点。北京大学的勒希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的意义。他说:“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前提的批判,即反对将人的规定归结为外在世界的对立物”。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存在(不再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存在)看成生活实践或人

的生存本身。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向东方的“同一”哲学的靠近。

人与其对象或异己物的融合始终是人类哲学思维本身就具有的价值论取向。但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就某种客观效果、客观目的而言？还是就过程本身的主观感受而言？湖北大学的朱正琳在此意义上对性爱的形而上学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以叔本华为代表的性爱学说之所以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就在于他偏重于性行为的生殖目的。朱正琳称之为“生殖原则”。相反，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这一“快乐原则”的副产品。叔本华与弗洛伊德的出发点看起来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原始力量（意志或原欲），但叔本华由于过分夸大了认识在摆脱“意志”中的作用，从而沉入了一种禁欲的、无我的、自我克制的涅槃境界；弗洛伊德则要求使那种性冲动的满足感持存于人的生命的全过程，并升华为持久的激情（爱情）。通过对这两个人的比较，朱正琳认为任何“神思”都不能阻止人类要把“人的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会上几乎每位哲学家的发言都涉及到人的现实处境问题。哈贝马斯（Habermas）的批判社会理论能否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曾引起了施勒德尔巴赫与哈特曼的争论；波恩大学的林克（D. B. Linke）教授针对中国人民大学钟宇人教授的报告，就海德格尔能否算一个“非理性主义者”的问题发表了她的不同看法。武汉大学邓晓芒关于《普列斯纳的文化起源论及其方法》的报告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普列斯纳（Helmuth Plessners）通过把现象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的文化起源，从而在理论上所达到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解释和理解、间接规定和直接感受相统一的结论，更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无论如何，如施勒德尔巴赫教授所说，体系、整体与生活世界对立是当代世界中人的处境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面对技术对人的统治，施密特教授提到了海德格尔的“冷静”；当他的夫人驾驶汽车时，他“冷静”地坐在上面。这被理解为一种面对技术的人生态度，一种“得到了正确理解的自由”；通过冷静，对于人来说，世界才作为他的真正家园向他敞开。”但人的“家园”到底在哪里？人何以“消解”“中心”与“整体化趋向”？湖北大学的张志扬教授对此发表了他的独到见解。这里所涉及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人类中心说所造成的人的失真状态，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语言中心主义及人本主义偏见所造成的影响。在对人的“家园”的向往中，也许那使某些哲学家多少感到若有所失的无定向之“风”，在张志扬这里正成为人回归大地之根（语言的本质）的还家之路。

---

（上接封二）

四平八稳、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创造一个活跃的文学交流氛围，没有强有力地团结和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中青年作家。湖北作家群龙无首、呈“放羊”“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也是导致湖北作家走向封闭的外在原因之一。二是刊物的组织与扶持不力。他们对湖北作家追踪而又广泛的联系太少，加之编辑的总体水平有限，降低了自己刊物的质量和声誉，使湖北作家将其作品拿到省外刊物上发表。三是理论界的衰弱与迟钝。他们不仅不能敏感地把握当代文坛的整体态势，及时地向作家提供理论的武器，就连具体作家作品也绝少给予及时反应。池莉的《烦恼人生》，外省文艺理论界都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湖北文艺理论界却保持着令人悲哀的沉默。更不要说发现新人新作了。缺少理论阵地、缺少敏锐的批评大家，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指导和推动作家进行更深入创作。

这是湖北文坛在当代中国整个文学格局中出现倾斜的又一困境。

与会者一致认为，湖北作家陷在四面重围之中。他们能否忍辱负重，冲出重围？这些热切关注湖北文学事业发展的年轻人也在沉寂中看到了湖北文坛振兴的希望。他们正在写作“湖北文坛整体报告”从更深层研究湖北文坛的发展格局。

“路漫漫兮而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们坚信屈原不会在今天死去

（远 珍）